

“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 年 6 月 24 日至 28 日,“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学术月刊》编辑部、天津古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日本、韩国等地的海内外 50 余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收到与会学者提交的 30 多篇论文,围绕“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明代历史对世界文明进展的影响”的主题,分别从对明史的评价、研究范式、社会变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族群关系、对外交流、宗教的不同角度,对明史研究进行了再思考和纵深探索。

对明史的评价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总括性的是徐泓(台湾东吴大学)所做的题为《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主题发言。从对明史一般的恶评到近来的渐趋正面评价,徐泓对清以来对明代的评价做了全面的检视与回顾。他认为,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应当本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职业伦理,减少时空氛围的影响,以期对明代这个“多重性格”的时代和“多元结构”的社会得出和而不同的共识性评价。

陈支平(厦门大学)在《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史》中提出,如果把中国明代的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去考察,明代是中国历史从“区域史”迈进“世界史”的关键时期。这种趋势应是我们认识明代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标志。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在《明史之外看明史——关于明史研究范式的几个问题》中,在对明史研究的断代史为史的“国家史”取向、“西方中心主义”“地方知识”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联、“支那学”与“满蒙学”阴影等问题进行回顾后,指出在当前新的学术生态中,仅从明史内部来看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明史之外来做出审视。

【收稿日期】2010-08-10

赵世瑜(北京大学)在《“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中着重从区域社会史的路径来考察易代之际历史现象的复杂内涵。他认为其时在地方社会存在大量的失序状况及“不清不明”的集体认同,而“清承明制”也有着更长期的渊源使得“无明不清”。因此在对明、清的评价中扬抑任一方都有失之偏颇之嫌。李新峰(北京大学)则在《论元明之间的变革》中梳理了宋元变革说、明中期变革说、宋元明过渡说之后,提出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视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张海英(复旦大学)将关注点集中于晚明,认为同鸦片战争后大量白银外流带来的经济崩溃相比,晚明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交流是无可争议的辉煌,而因为还未受到西方近代化影响,研究晚明的社会变迁,具有揭示封建专制主义盛衰规律和省察社会发展趋向的深刻意义。同样关注社会变迁的,还有刘婷玉(厦门大学)对成化、弘治时期作为明代重要转型时期的研究,她通过梳理明清史料中将成弘时期作为“盛世”与“变世”的记载,从社会风气、经济、政治结构、选官制度等不同角度,探讨成弘时代怎样成为后人的记忆资源而影响当世发展的。

与会学者还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精英方面,万明(社科院历史所)通过对明朝诏令的考察,揭示了步入中华帝国晚期的明朝法律体系的变化,是以诏令为中心的例的凸显与综合法典的形成表现出来的。明朝新的法律体系开启了后来清朝的法律体系,约占有中国帝制时期约 1/4 的时间段,凸显了明史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山本英史(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通过对地方官们到任、离任的时候时常采取的特异行动(performance)来考察明清时代的地方统治当中,地方官员如何平衡理念与实态以实现有效治理的。阿凤(社科院历史所)则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考察了明代民事诉讼程序中州县的审

判、府、巡按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讨论了民事案件的京诉问题。张兆裕(社科院历史所)探讨了明代对传统荒政的继承与完善,就明代预备仓的创设、监察官员的地方化、阙失的移民就粟、赈灾制度中修省之制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赵中男(故宫博物院)在论文中指出了明代宫廷典制具有全面性、繁杂性、综合性、法规性等特点,并认为从宫廷礼仪的角度重新认识明代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关政治精英的研究,有解扬(社科院历史所)对于万历年间大臣冯琦的研究,认为冯琦的举措实为展现于晚明政坛上的一种务实处理朝廷政务,尤其是审慎判断与灵活处理君臣关系的政治手法。江柳青(厦门大学)对同为万历年间大臣劳堪的研究,则是将其作为清算张居正的政治运动的典型,是万历朝政由改革图强转变为混乱无序的表现。

经济。元廷植(韩国江原大学)以明清时期新经济发展动力的出现为背景,对福建地区烟草产业的形成及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阐明了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新作物的突出作用。王日根(厦门大学)则通过将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海洋经济与山区经济的发展相联系,重点揭示了这种山海联动经济的形成过程、影响与政府治闽政策的变化。林枫(厦门大学)则通过回溯明代商业经济史的既有研究,关注到将明代国内外市场贸易联系思考,从单纯商业史研究到与社会史、文化史结合的新的研究动向,并指出了当前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的若干不足之处。

文化。商传(社科院历史所)从文化史的视角对明代的文化特质进行定位,认为明代中叶以前的文化以官文化为主体,明中叶以后,民间文化繁兴,取官文化而代之,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张宪博(社科院历史所明史室)通过对东林党人讲学事迹做详尽的个案考证,对明末史事多有发明,认为“讲学非亡明,攻讲学者亡之”。陈时龙(社科院历史所)则更多的将明代的学人讲会作为社会现象来考察,廓清了明代讲会的规模、会址、会期及频率、主讲与成员、内容、气氛、会约与会簿、会语、经费和教化功能。

军事。张金奎(社科院历史所)从族谱资料出发进行的考察,呈现明代三个卫所军户家庭的演变实态并进行比较,揭示了明帝国广大疆域中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造成的影响。王尊旺(厦门大学)则对关系边镇军饷供给的明代遮洋总的设立时间、运输路线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同样关系到明代边镇防御的,还有明代长城图籍的绘制,赵现海(社科院历史所)即对明代的四部长城图籍

《九边图志》《九边图论》《皇明九边考》《九边图说》进行研究,指出其在明代边防图籍编撰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后世认知与研究九边的影响。

环境史。钞晓鸿(厦门大学)围绕着项忠与明代关中水利修筑的关系,考察了不同文献中对通济渠、广惠渠记载的分歧之处,指出人物传记中史料选取具主观倾向性,应引起特别注意。佳宏伟(厦门大学)通过对明清之际的江南姚廷遴家族作医疗史、环境史的考察,反映了明清交替之际的“天灾人祸”对于一个家族社会的影响实态。

族群关系。奇文瑛(中央民族大学)就明朝接受的几近百万的内迁归附人进行考察,揭示了明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明代北方民族杂居中原和不断交融的历史趋势。彭勇(中央民族大学)考察了明中后期一支全部由北方少数民族组成的武装力量由“达官军”到“忠顺营”的发展演变与民族融合过程。周雪香(厦门大学)则从明中叶的流民对南方山区的开发入手研究,梳理论证了“客家”最初应是明隆庆三年长宁、永安建县后,当地土著对来自闽西及粤东北潮惠地区的“异邑民”的称呼。

中外交流。范金民(南京大学)对郑和下西洋史实进行了详细论析,他通过严密的史实考证,回应了当前郑和研究中的某些不实之处,中肯的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进行评价,认为其是明朝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地位和影响的重要标志。

宗教。何孝荣(南开大学)结合汉、藏文献史料,对明宣宗崇奉密教的表现、原因及影响加以论述,认为其一方面导致了明代朝政的腐败黑暗,一方面对汉藏文化交流多有促进作用。高致华(厦门大学)则论述了台湾“开台圣王”与“开漳圣王”信仰文化的流布与传承,凸显了明以来宗教信仰对台湾移民社会之形成的重要意义。

由本次会议可以看出,将明史与世界史相联系,是未来明史研究的重要趋势,在会议的最后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陈支平指出,由明至清与世界交流的渐趋沉寂,不仅是明代自身发展趋势所全然决定,也与其时欧洲本身历史的发展不无关系,会议还就此特别邀请台湾辅仁大学的世界史专家王芝芝发言并展开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表示,将就此做进一步的研究探索,并积极搭建围绕这一问题的学术交流平台,以期将明史研究在研究范式和思维向度上有所推进。

(黄真真 刘婷玉)